

“劝市民勿街头施舍”是在试探舆论

■今日视点

7月21日的《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海淀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发放《致全体市民公开信》。公开信中说:希望市民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钱物,如果要行善,应通过政府开办的捐赠机构进行捐助,只要不直接向街头职业流浪乞讨者施舍,街头流浪乞讨现象会迅速减少。

我知道,北京明年要办奥运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北京的一些政府部门居然这么

有创意,居然会为了减少街头流浪乞讨现象而发公开信劝市民不要向乞丐施舍。今天你可以呼吁大家不要向乞丐施舍,明天是不是可以发公开信呼吁大家不要跟街头的小贩买东西?毕竟,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街头小贩也是很影响城市形象的。没有了乞丐和流浪者乃至街头小贩的北京城,难道就是人文奥运、和谐奥运的最佳载体?这未免太荒唐了一点,这么多城市办过奥运会,却从没听说过奥运会期间不许乞丐和流浪者在街头现身的。

我爱施舍就施舍,政府部

门难道连我们对流浪者的一点爱心也要管?为了奥运会期间街头的“形象”好一点,难道北京要把乞丐统统赶回家不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媒体曾广泛报道过“奥运期间劝离民工”的新闻,虽说后来有关部门出面辟谣说从没发过“劝离民工”的通知,但从现在救助站劝市民不要施舍乞丐的思维逻辑来看,“奥运期间劝离民工”的新闻未必就是空穴来风。好在这次救助站只是发了个公开信,只是“希望”市民不要向街头乞丐施舍,并没有像有些地方一样

规定乞丐不得在什么地方乞讨,也没有动用城管队员强行收容流浪者和乞丐。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者文明了起来,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发这么荒唐的公开信,而是应该意识到,一座城市的和谐与文明,在于最大程度地宽容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包括街头的流浪者和乞丐。相反,公开信的出炉,让我们读出了管理部门渴求街头政绩的焦灼感和对舆论小心翼翼地试探。

现在的管理部门也都变得聪明了,他们知道很多时候不能跟舆论对着干。否则的话,一旦出台措施强行收容乞

丐,将会立即引来舆论的强烈质疑。先来个看似文明的公开信试探一下舆论的反应,如果反对声没那么激烈的话,相信强制性的举措马上就要跟着出炉了。今天是流浪者和乞丐,也说明明天就会是街头小贩和民工兄弟。这个时候,社会舆论就显得至关重要,需要更多的专家和学者站出来指出“劝市民不要施舍乞丐”的荒谬。倘若舆论偏向了有些网友所说“非强制性举措体现了管理的一种进步”的话,那么,管理部门的小聪明就真的达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了。

(尹之)

贪官辩称不懂法 值得警惕

■公民发言

“对法律的错误认识,使我以为正常履行职务而收取他人钱物的行为不是犯罪。”日前,安徽省枞阳县原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章效生在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法庭审理时,就自己受贿行为抛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

(7月21日《检察日报》)

堂堂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竟声称“正常履行职务而收取他人钱物的行为不是犯罪”,你会相信吗?在我看来,这个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不是不知法,而是非常懂法,深知“不知者不罪”之道理,以至于想利用生活常识钻法律的空子,博得法院的“法外施恩”。值得警惕的是,类似章效生这样自称法盲的落马贪官近年来越来越多,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在分析贪官反省材料时发现,其中81.4%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其实呢,这些贪官并非都不懂法,而是一些贪官“罪到临头”还企图装疯卖傻以蒙蔽办案人员。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遗憾的是,一些贪官都罪到临头还在想方设法开脱责任。也正是这种荒诞滑稽的诡辩、开责,将贪官最后的一点羞耻感也彻底丢掉了。对于这类毫无羞耻、见了棺材还不掉泪的腐败官员,司法机关应依法予以严惩,要让他们知道,“自认法盲”也不是贪官的救命稻草。

(陈霞)

本版文章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加息减税背后的惠民理念

■公民发言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各上调0.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

(《人民日报》7月21日)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加息减税最直观也是最切身的价值也许还是其直接的惠民效果——两项宏观调控政策,差不多合计可以一年带给百姓800亿左右的实惠。

检视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其所以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过热问题,乃至动辄容易“发烧”,经济发展的成果——国民财富没能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得到公正的分享、分配格局十分不合理,正是一个根本症结。消费所以长期不振,说到底当然还是收入分配问题——太多的人囊中羞涩,拿什么去消费?或者即使稍有积蓄,由于政府公共投入严重不足,众多重要的民生领域都需要公众自掏腰包

乃至花大钱埋单,人们又如何敢去后顾无忧地放心消费?

同样,“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收入分配问题——正因为太多人不敢放心消费,所以钱不得不大量沉淀在银行,导致储蓄率过高,而面对储蓄过高、资金过剩,银行当然急于放贷;另一方面,利率过低再加上20%的利息税,储蓄收益实际上沦为负值,于是资金显得极为廉价、过剩,如此资金成本状况下,银行放贷冲动自然更加难以遏制。

如此看来,加息减税的“组合拳”固然有利于从惠民和提高公众收入的角度为经济降温、促进其发展的健康协调,但从根本上看,要彻底改善国民收入分配这个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问题,仅止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更进一步的调控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比如,通过完善和深化市场机制(如消除垄断),提高一次分配的市场效率;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尤其是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如教育、医疗、住房),并降低畸高的行政成本,增强二次分配的社会公正。

(张贵峰)

“假哈佛生”更需要的是教育

■热点纵论

随着连云港学子王洋给快报记者发的短信:“我没有被哈佛录取,请贵报向大家解释道歉”,一场乡村学子进哈佛的骗局终于真相大白了。

(《现代快报》7月21日)

记者的认真求证有了结果,好心的人们知道了真相。专家纷纷分析原因,并呼吁给骗局的制造者一个宽容的微笑。不过,我只觉得沉重,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毋容讳言,宽容是一种社会文明,是对人们自身的缺点、探索中的失误、无意的过失采取宽恕和包容的态度。宽容不应当适用于故意的欺骗、蓄意的欺诈。如果对腐败、造假、制毒有毒食品也一概宽容,那么社会将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诚信就会泛滥。

我宁愿相信此时的王洋在经受着内心的煎熬,

而这正是他起码应该承担的后果。编造系列谎言欺骗善良的人们,应当受到谴责,尽管他才满18岁。现时社会诚信的缺失一直为大众所诟病,而原因之一就是诚信的成本太低,一旦假象被揭穿,造假者并无大碍。

王洋毕竟还是个孩子,自编自演这场闹剧也确有多方面的原因。闹剧的参与者都在反思,专家们在发表评论,但大都缺乏对王洋事件的具体指导。我欣赏常春藤SAT培训师张老师的观点,“我更担心他的一生——有时候一点小事就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张老师终究是搞教育的,看问题比专家们实际,更关注具体的人。对王洋来说,大家需要有宽容,但更应该加强教育,帮助他回归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这方面,原先兴致勃勃的王洋母校可以冷静下来做点实事的。

(袁元)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最愚蠢的事 莫过于政府盖豪华楼

某镇人均纯收入仅1000元,年财政收入100余万元,竟凑400多万元建7幢豪华办公楼,共有120间房,每个办公室都是套间;某街道办事处利用搬迁之机,耗资数百万元建10层办公楼,门前是数百平方米的广场,要跨上29级石梯,仅装修就花了200多万元……重庆市纪委近日通报对一批豪华办公楼的查处。(《华西都市报》7月18日)另据报道,四川某地法院为建豪华办公楼欠下千万巨债,如今穷得连电费都交不起。

看着一起起豪华楼丑闻曝光后,一批批豪华楼仍迎着媒体的“扒粪运动”和中央的“查处行动”此起彼伏,不禁长叹。倒不是感慨某些政府官员敢于对抗舆论屡批屡犯的勇气,不是感慨官员对豪华楼近乎病态的痴迷,而是感叹:这年头,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政府盖豪华楼了,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和官员一蠢再蠢地盖豪华楼呢?

政府盖豪华办公楼所以愚蠢之极,在于这种事情的曝光率和败露可能已经非常的大——你盖了那刺眼、招摇、与地方发展极不协调的政府大楼,在这中央锐意治理、民权意识张扬、媒体曝光亢奋、互联网贴图方便的时代,总有一天这刺眼的玩意儿会以某

种方式被顶上舆论审丑的风口浪尖。

在以前,媒体很少曝光政府豪华办公楼,老百姓由于权利贫困,对身边的这些豪华楼缺乏公民的权利感,不觉得这跟自己有多大关系。随着媒体曝光频率的加大,老百姓的权力感越来越被激发出来。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建这些楼花的是自己的纳税,自己有权去评头论足,有权利要求政府把钱花在民生和公益上——在这种权利诉求下,他们会对政府建楼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将其曝光。

另外一方面,在既有体制的束缚下,老百姓可直接监督政府的事务比较少,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旅游之类,根本不可能跑到政府办公楼里看官员用的什么办公桌、存折上有多少钱——这种制约下,公众亢奋的监督热情和能量都集中到那竖在那里无可隐藏的政府大楼上,只要你建了楼,老百姓就看得见,照片拍下来曝光到媒体你就无可抵赖。可以说,政府大楼承载了公众差不多所有的监督能量,一双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根本无可逃避。

再就是,这是一个伟大的互联网时代。在纸媒时代,纸媒是信息传播最主流的通道,

传播是线性的,普通百姓的话语权受到了诸多制约,而在网络时代,网络是一个开放的话语平台,互联网是一个民众掌握了传播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时代,刺眼的豪华办公楼很容易被网友传到网上去成为全国性丑闻,众目睽睽地存在着你回避不了,不可能像非典病人那样拖着在大街小巷里藏匿,拍下来曝光了你就得认账。央视《新闻调查》和“天涯杂谈”近日联手搞了个“征集各地豪华楼堂馆所图片”的活动,鼓励各地网友曝光当地豪华政府超标楼堂,短短一周内,帖子的点击率超过了7万次,各地网友纷纷提供当地政府部门的豪华楼所照片,仅“天涯杂谈”论坛的跟帖就多达1500多条。

如此语境下,最愚蠢的事情也就莫过于盖豪华办公楼了。既然如此,为何还有那么多政府犯蠢呢?我想,这是绝对对权力造成的绝对愚蠢,沉浸于很少受到监督的权力游戏中,他们太迷信权力,太相信自己的力量了,以致于觉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摆平一切,沉浸在这种膨胀的权力幻觉中,很多时候就会说出很多常人觉得很弱智、做出很多常人觉得很愚蠢的事情,自己还浑然不觉。

(作者曹林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中国日记之杨耕身专栏】

学者为何要分“民间”和“官方”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公布该院最新研究成果《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按照7月19日《中国青年报》的说法,这份出自“民间学者”之手的方案是目前公开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民间学者”上的引号是我加上去的。如果说这第一份高考改革方案颇有令人欣然处,则“民间学者”的说法却让我狐疑良久。

什么是民间学者?与民间学者相对应的又是什么?该方案的提出者,乃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自然是报道所称的“民间学者”了。查询资料可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总部设在苏州的民间教育研究机构。由此不难知道,由于机构是民间机构,所以学者也就成为民间学者了。这也意味着,假如机构是官方的,政府的,那么学者也就成为官方学者或政府学者了。但是什么时候起,学者的身份是附着于其所在机构的?

这是让人费解的。杨东平先生作为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他是怎么兼具民间与官方于一身的?无论如何,官方与民

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断裂,那么我实在不知道,一个学者,是如何做到能够游刃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如是求诸杨先生本人,怕他也是备感怔忡失语、不可名状的。

但学者因机构而被分为官方或民间,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无意识的、习以为常的分法,而且这一分法俨然功能明晰,界定分明。不久前就有人专门撰文称:官方学者受雇于政府或政府机构,他们的观点通常要与政府或政府官员保持一致;而民间学者则独立或徘徊于政府之外,没有或很少得到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通常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因此民间学者又称为自由学者。

我感到有趣。当学者成为政府或政府机构的“雇员”,当他们的观点必须要与政府或政府官员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还成其为学者吗?充其量,他们只是些专家。学者与专家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学术是否精进,而在于立场是否独立。学者无论在观点、思想乃至行为上,是自成体系的,是独立的。换言之,学者不会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

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的,备受关注的北京东四

八条拆迁项目中,其“10人小组”的专家论证制度因为论证不公而遭致全面质疑。然而如果按照当下流行的分法,这“10人小组”俨然是可以称为“官方学者小组”的。

在这方面,是有必要搬出德国费希特老师关于学者使命的论述来的。他这样说道: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他应该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这也表明,没有独立之立场,哪来学者之精神?独立的学者,或许更接近于我们目前所称的“民间学者”吧。

但是说到底,从本质上说,学者就只能是学者,是没有官方或民间、在朝或在野之分的。如是之故,当“官方学者”仍然大行其道的时候,所谓“民间学者”的存在仍只是一种不可名状。

对于杨东平先生,我其实是愿意视其为一名独立学者的。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对其主持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抱以期待。但是我不知道,作为一名“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否最终能得到“官方学者”的认可,始可能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番不可名状。

(作者杨耕身系资深时事评论员)